

于光远◎著

我的故事

中

青年读本

黄孝通题



北京出版社

我的故事

★

作者：[作者姓名]

出版：[出版信息]

青年读本

我的故事

于光远 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我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直没有去了解，因而在写《田家英的悲剧》时始终一无所知。因此在《新华文摘》上见到王凡写的这篇文章后，很有兴趣地读了。从文章的口气来看，所写并非作者亲知，而是调查所得。文中虽未交代清楚材料来源（也许交代了，但被《新华文摘》的编者删节了），但根据我对田的了解和在“文革”初期的体会，我认为文中所写基本可信。

根据这篇文章，我将补充：

（1）田死于1966年5月23日中午，这是我原先不准确知道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房东找我的时间可能在六月初（仍说不准确）。

（2）从田家英的情绪变化中，在“文革”前有相当一个时期我就看出毛泽东已不那么喜欢他了。而在1961年毛还是比较重用他的。那年春天我和他一起坐火车去广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时，他的情绪是正常的，我感觉到这一点。以后见到他时的感觉就不一样。因此我觉得王凡写的这篇文章中把1962年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在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的前前后后，是可信的。对1959年田在庐山会

议的表现，毛不会不知道，但还能容忍。而1962年田回京前后，参加刘少奇主持下的文件起草工作，毛就不能容忍了。田对毛的观察，当然比一般人深得多。如他在1961年春告诉我：曾希圣不久前去杭州向毛宣传安徽有个别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经验。毛听了说了一句：“你可以去试一试，可是要准备挨批。”曾以为毛批准了自己去试点，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田对我说：“曾希圣真蠢，毛主席明明是反对包产到户，对他进行了警告，他却听不出来。”王文中说，毛泽东的习惯是，当他不同意某种意见时一般不当即表示，或者不说话或者说一些别人捉摸不准的话。对这，田知道得很透。可是了解毛泽东较深的田家英，或许对毛刘之间的关系还是估计不足，并且可能对七千人会议后的毛泽东的思想状况有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做了这种最犯忌讳的事情。也许田家英由于自己的脾气使然，明知犯忌讳，也不顾虑，直说了。从王文中也可以看出田对毛刘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觉察。王文中讲的这个“团结问题”其实早就存在。在游泳池汇报时，田也觉察了。田说不上从维护团结出发，把刘少奇也有的看法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他知道再把这个说出来，后果将更严重。王文中写，游泳池汇报第二天毛就批评田家英回京后“不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却在居仁堂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文件”，事情就进一步表露了出来。看来那就是田在游泳池汇报之前，毛就掌握了田的情况，只是田自己还没有觉察这一点。



不过汇报时毛这么一问，聪明的田家英也就觉察到这个“团结问题”的存在。这时他怎么能再多说什么呢？王凡的文章说田是为了维护团结才说是自己倾向包产到户的，我看是低估了田的智慧。

（3）在1961年，我与田的一次闲聊时，我和他对包产到户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么重要的问题，要掌握足够的情况、经过比较深的思考才会形成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闲聊时只是议论曾希圣的蠢和毛泽东的说话的方式，没有涉及事情的实质。那时田和我一样，不会去反对包产到户，也不会主张包产到户。田和我不一样的地方是1962年后，我没有再去农村调查，而他去湖南再作调查。据王文，田在这次调查后形成了对包产到户可以考虑再试一试的想法。这在当时是最大胆的想法。而我因没有再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未能像田那样前进一步，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跟了上来。

（4）我在1961年再见到田时，感到他“怪”话说得多了。王文中说他对自己妻子许多话不讲，比如“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样的话倒对我说了。道理很简单，我和他没有工作上的关系，不会发生要我交待与田家英来往的事。事实上在“文革”中就没有人要我讲田家英的事。但他有苦恼，我还是一个可以让他发泄一下的对象。上面说了田也不对我讲什么具体的事情，我也从不去问，他只要讲一些抽象感情上的话，我就会明白。有江青这样一个搬弄是

非、要阴谋诡计的人在毛身边，田的苦恼是完全有根据的。当然田也知道毛泽东和江青之间也存在的矛盾，在“文革”前田还有毛能与江疏远的希望。后来，田越来越感到毛也有利用江的动向，也就不能不担心国之将亡了。

(5) 对田陈交恶的事，田对我讲得很多。朋友们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不少，田在我面前讲到陈的时候毫不留情。不过他知道毛对陈也不满意，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一下子这么重用陈伯达。“文革”前不久的1966年初，中宣部开会讨论副部长间的分工，陈伯达自告奋勇去管“戏剧改革”一件事，而且只管这一件事。当时列席部长办公会议的我，感到很奇怪。“文革”爆发后恍然大悟，这表明陈打算由此投靠江青。结果陈成功地成为“文革”中的大红人。我也深知陈的投机性虚伪性，但是他有这么大的野心，当时还是估计不足。

(6) 田家英的悲剧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性格不适合做毛的秘书工作。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的语言来说，喜欢自由散漫。却不幸到了这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王文中写的艾思奇，其实并不是什么中央“秀才”。“秀才”云云是写文件的笔杆子。艾思奇只是一个非常忠厚、不懂权术的学者。他虽然没有像田家英那样在最高机要的地方工作，也不参加写文件的事，但也不幸进入当时是非之地的中央党校。在那儿他受到很大的迫害。田

艾两人都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艾在 1966 年“文革”尚未爆发时去了一趟杭州，就在政治上被江、陈等利用。江青决不会喜欢艾思奇这样的人，只是能利用时就利用一下。我在写《忆艾思奇》时，还没有把这样的事写进去。田和艾都是悲剧式的人物。中国有各式各样悲剧式的人物，在我们中国悲剧式的人物何其多！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人，真应该自我庆幸。

我也写他二三事

1993年《瞭望杂志》发表了曾彦修写的《于光远二、三事》。朋友们写的东西看了觉得特别亲切。现在我把它作为附录收在这篇文章后面。

我和彦修是1947年一起参加中央组织的一个“土改工作团”时熟悉起来的。那个工作团的成员都是比较老的同志，如抗战初期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高文华、在红军长征中赫赫有名的女将张琴秋等。有的人，我指的是廖鲁言，从年龄上似乎比我们大不了很多，但是从他的神情谈吐，没有人会把他看作青年。因此，这个团中有一个“三青年”，指的就是曾彦修、史敬棠和我。还有一个青年是毛岸英。他的年龄比我们又小几岁，是工作团中的“小弟弟”，“三青年”中也没有他。

曾彦修是四川人，年龄比我大概小三四岁。我和他特别谈得来。他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的见解。那时他还不是杂文家，没有用严秀这个笔名，但是我知道他文笔比我强。我是个搞数学、自然科学的“料”，文字干巴巴的。在1941年给轻骑队写稿时我就常常想到这一点。我是在这张墙报上文章写得最多的人之一。这张墙报后来

被认为问题严重而受到批判时，我就因为文字平庸直叙，在读者中留下的印象比较浅，没有受到特别注意。除了思想活跃、文字能力强之外，曾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人特别地瘦。可是建国后他从南方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来时，我看到他肌肉丰满了起来，前后的反差很大。他是一个体型唯一使我注意到的人。在这里我写起这么一件极小的事，我自己也觉得挺可笑。

我们之间有这样一种友情：他关心的事，我知道了不会忘记，而且也关心。比如多年来他做着一件很重要的事，系统地清算斯大林时期的很重要的人物“日丹诺夫”。日丹诺夫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中比较有学问的人。他在苏联共产党内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学术界给各学术领域——文学、艺术、政治、哲学、历史、自然科学……中的有创见的新思想无限上纲，挥舞棍子猛打。他的思想在我们中国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中国党内也曾有过同日丹诺夫相似的人物。曾彦修做这件工作十分认真、非常严肃。从1986年开始已经写了十年，搜集到最可靠的材料，用严格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他自己写一部分，并且找了专门有研究的人写另外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可是直到现在尚未完稿，真是“大器晚成”。它的出版将在国内外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文化界不少人知道曾彦修（严秀）是个杂文家，不知道他还是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他肯下大功夫，用无法与之争辩的事实材料

和逻辑思想来进行战斗。1983年他为了说清楚自己在人民出版社当社长时，出版“灰皮书”的事实，写了一篇证据确实逻辑性很强的材料驳斥胡乔木对他的非难。这个材料连同七个附件有许多万字，使胡看了哑口无言。

曾彦修对我关心的事也一直记住，也很关心。知道我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立场，常常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就在昨天（1996年11月18日）还收到他从1996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上剪下来的一张剪报。该报记者以《非此即彼：只有一个说谎者》为题写了一段导言，然后在报上发表了《〈中国气功科学〉：美国正在开发“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科协简报〉：美国终止“人体特异功能”》两则截然相反的报导。这位记者说，这两份材料都是何祚庥和郭正谊提供的。我看了这篇后。回答是清楚的，《中国气功科学》传播的是谎言，《中国科协简报》介绍的是真实情况。我也看出《南方周末》发表这样一篇东西意在揭露，而且用这样的方法来报导，也很有趣味。不过我又觉得一般的读者看了之后会看不清楚，曾彦修在信件上写道：“此件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特寄上供参考。此报历来是反对特异功能的，这也可能意在揭露。又《参考消息》已登过，因无效果美国早已大大减少此项‘研究’的拨款的报道。”这也说明他关心我关心的事情。我手边正有一篇署名明道的文章《心灵战？还是???》，把有关这段历史经过讲得很清楚，准备复印后给他看看。



曾彦修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过去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楚具体。有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我只是“知道”，具体情节就要向他请教。我希望他能把自己亲自接触的事情写下来，让后人知道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怀念冯契

我和冯契是在“一二·九”后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抗日扩大宣传团期间相识的。那是1936年1月间的事，距今已有六十年了。

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被录取者按照考分排列，同学们把第一、二、三名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冯契（他在学校的名字是冯宝麟）是1935届被录取者中间的榜眼。那时我有一个偏见：考分高的学生一定是特别重视课堂里的那些东西、独立思考较差的人。在南下扩大宣传途中，我与冯契相识并交谈后，纠正了我的这个看法。我发现他对政治、对哲学有他独立的见解，是个喜欢动脑筋也很会动脑筋的人。我觉得同他很谈得来，真可以用“相见恨晚”几个字来形容。

在南下扩大宣传期间，我发现他的一些特点：他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评论家。我记得走在路上，谈起我俩都看过的几部中国哲学史，他都一一指出这些书的不足之处。我们也谈到彼此都有些了解的中外哲学家，他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意随随便便给以较高的评价。同时他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却有颇高的自信。我觉得他讲得也颇有些道

理。同时我有些奇怪，他小小的年纪，怎么会有这样的谈吐。那时我二十岁半，他比我低三个年级，我以为他只有十七八岁，后来我才知道，他上学比较晚，所以年龄与我差不多。其实我那时也是“小小年纪自视甚高”，我们都是风华正茂、少年气盛。

南下扩大宣传时，我们每天都要徒步走几十里路，我喜欢和他走在一起，边走边谈。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在高碑店被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派人押送回北平后，我和他都成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我们还是经常来往，谈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他是哲学系的学生，我是物理系的，但对哲学很有兴趣。哲学是我们之间谈话的主要内容。1936年，我还选了一门张申府教授开的“形而上学”，张先生的教学也是我们常常议论的题目。那个学期，我在清华图书馆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那时他还没有读过这两本书，有时我就向他介绍这两本书中的某些内容。

我和冯契一起在清华的时间很短，只有四、五个月。1936年我大学毕业后就离开北平去了广州。抗战前，我从广州回北平停留了一个短时间之后，就去太原、武汉、广州等地工作，以后又去了延安……同冯契一分手就是十几年没有联系。不过在清华那四、五个月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虽然久未相见，却时时想起他。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当我们重逢时，他已是名副其实

的哲学家了。许多年来他在哲学研究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用问，我就相信，他一定取得了高水平的成就。我一直希望能再像 1936 年那样好好地听听他的新见解，可一直没有如愿。他住在上海，很少来北京，我虽然去上海的次数不少，但每每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来去匆匆，找不出安安静静谈学术的时间。我去过他家一次，也没有久坐。他来过宾馆看我，但总是遇到来访客人很多，没有能谈我们两个人特别有兴趣的问题。一直到他去世，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长谈的机会。

有一次我在上海同他谈起自己的一个想法：在“真”、“善”、“美”之后，与之并列，再加上“贵”和“智”两个字。即在“真否”、“善否”、“美否”之外，再加上“值得否”、“聪明否”两条作为评价行为和思想的标准。我对“价值观”一词常作比较狭义的理解——即上面说的“值得否”。他听了我的这个看法，和我谈了一大篇话。讲了真、善、美三位一体，讲了真善美与自由、真善美与价值观（比较广义的价值观）的关系等等。今天看了童世骏教授寄来的关于在纪念华东师大哲学系建系十周年时准备把讨论冯契的生平和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的函件之后，使我明白了，那次他同我谈的那一篇话一定是他那本《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不过他那天并没有告诉我他写过这样一本书，以后也没有寄赠给我。他作过专门的研究，写过这样的书，因而他对我讲得就特别透彻。

前年当我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我是很悲痛的。我想，自己应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认为，作为他的好友和同行，对他那样一个在哲学上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写出的不应该是随笔而应是有一定分量的哲学文章。这时候我就反思，我对他的哲学著作学习得太少了。听说不久前他出了一本《智慧的探索》，我手边没有，就向他的家人去函要了一本。我打算在认真研读了之后动笔去写。可是实在没有能抽出这个时间，至今未能动笔。原先我想，这件事并没有时间性，可是现在童世骏教授来了信，要求在五月中旬以前交稿。我算了一下，今年三、四、五月我都有活动，那一篇文章是肯定写不出来的。因此只能写这样一篇，略表自己的怀念之情。

1996年2月26日

我又一次到冯契的家

1996年11月29日，我又一次去了冯契的家。

说“冯契的家”，我认为还是比较确切的。虽然他已经不在，但是他用的书、坐的椅子、写字的桌子都在原来的位置。我觉得同十几年前第一次去那里时比，似乎没有变化。他的老伴——也是我的清华同学，而且是同一个系的同学——赵芳瑛仍住在那里。也就是说，他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还是那个样子。因此除了用“冯契的家”这四个字之外，恐怕没有更合适的词汇了。

去了那里我才了解到他过世的具体情况：他并没有患不治之症。病情的进展极快。起因是便秘。我也有这种经验，几天便秘，我就有些紧张，不舒服。这次他便秘的时间长了一点。而上了岁数的人，灌肠之类是要小心从事的，但是真的时间长了，别的办法不见效，该灌肠时不去灌肠这是不应该的。他怕去医院，怕去了医生不让他回家，没有去。我也怕住院，能不去时我也会拒绝去住院。后来去了医院，护士不知道他有易噎易呛的毛病，结果他吃饭时不小心把一块馒头吃到气管里，造成窒息。如果在家，赵芳瑛知道他有这种毛病，经常提醒他小心，也许就可以避

